

客风南被与南洋儒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客家诗人 对星马华人社会的冲击

■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
兼任崇基学院院长

前言

莽莽群山海气清，华风远被到南溟；
万人围坐齐倾耳，椰子林中说圣经。

——丘逢甲自题南洋行教图诗（1900）

本文以两位清末名士——丘逢甲及王晓沧——在南洋地区宣扬儒学的经过作为考察的对象，申论儒学与孔教于清末时期在南洋传布之情况，并且分析南洋华侨社会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丘逢甲（沧海）和王晓沧（恩翔）两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名士，都是客家人，前者乃台湾抗日英雄，后者则系嘉应诗人；二人于十九世纪末年结伴南游，并宣示政府保商之意。渠料此次南游竟成为一次宣扬儒学之旅，所到之处，华侨皆以儒学宗师待之，邀请读经讲学，并因而掀起一次波澜壮阔的“兴孔学”和“建孔庙”之民间运动。本文旨在讨论这两位客家名人在是此儒学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分析这次儒学运动对中国和南洋华人所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一、丘逢甲、王晓沧的南洋之旅

丘逢甲和王晓沧，俱以诗名，前者有“东宁才子”之称号，而后者则有“岭东诗人”之雅誉，与同时另一位客家诗人才子黄遵宪（公度）齐名。丘逢甲，字仙槎，又字吉甫，号蕲仙、蛰庵；客家人，同治三年（1864年12月26日）生于台湾淡水厅（今苗栗县），父亲丘龙章（1833-1911）是个秀才，以教书为生，其传记云：“龙章待人忠厚谦和，信奉孔孟程朱之学，加上学识渊博，热心桑梓教育……”

乡人尊称他为“潜斋先生”。¹ 故逢甲自小生于书香之家，接受儒家教育之熏陶，幼年即能诗能文，颇有才名。九岁时作诗二首，传诵一时：²

一为《学堂即景》：

三斋书房菊蕊开，玲珑秀色满园堆；
儿童扫径尘埃地，灑灑观花影上来。

另一首题为《万寿菊》，用“冬”字韵：

采见南山岁几温，古色香艳秋容；
葵花合为渊明菊，灑灑黄英晋万钟。

少年时候的赏花读书的悠闲生活、立志功名的专心和努力，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目睹日本侵台而开始逐渐改变，换来的是忧国忧民的关怀及志气，终于在甲午战后挺身而出，组织义军，爆发成为台湾近代历史上有名的抗日建台之政治运动，此一经历影响到丘氏后来的整个人生。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割地求和，台湾因而沦于日本人之手，逢甲虽组织抗日义军顽抗，但事终不可为，乃内渡回粤东镇平原籍定居；临行前有内渡诗曰：“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名句，一时传诵人口。内渡后丘氏弃逢甲之名而不用，改号沧海，别号仲海，别文中多爱国怀乡之思，署名“台湾难民”、“海东难民”、“南武山人”及“痛哭生”等。³ 丘氏内渡后，先经福建泉州、广东汕头，再回到原籍镇平，卜居淡定村，自建“心泰平草庐”，名其堂曰“培远堂”，两侧厢房则名为“念台精舍”及“岭云海日楼”，可见其心迹。⁴ 先居于蕉岭，后寄籍潮州，闲时多与友人饮酒酬唱，作诗文以自娱，但不忘记台湾亡日缅怀乡土的忧思，以及对晚清政治改革献替之心。⁵ 其思想颇近康梁，尤其是保国保种保教之说，实肇因于此时，并非到了南洋之后才体提出来的。

至于王晓沧，字恩翔，为当时嘉应地区的诗人才子，新加坡《天南新报》刊载其著作多篇，新加坡诗人丘菽园著《星洲集》中提到其所敬佩的几位时贤，内中即有王晓沧。菽园所称道之“诗中八贤”，曰“南海康更生先生（有为），嘉应黄

¹ 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页17。

² 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页18-19。

³ 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页51，注一。

⁴ 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蕉岭县志》（兴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页695。

⁵ 丘逢甲内渡后所作诗篇及其分析，参见丁旭辉《由“沧海”及相关意象看丘逢甲内渡后的心境与梦想》，《汉字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6月），页367-390；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2年），页27。

公度京卿（遵亮），安溪林肇云正郎，灌阳唐薇卿中丞，黄冈潘兰史主簿（飞声），海阳丘仙根工部（逢甲），嘉应王晓沧广文，新会梁任公教习（启超）也。”⁶ 八贤中以康、梁及黄遵宪最人熟悉，丘逢甲和潘飞声⁷ 稍次，其他人皆不多为后世所知；王晓沧生平事迹并不多，仅知为梅州鹤岗凹人，拔贡生，1886年丘逢甲从台湾回籍应试时即与之结识，性好吟诗作对，留下来的诗不少。⁸

丘、王二人既同为客家人，又皆爱好诗文，兼又关怀家国，支持维新变法，故结为好友，时相唱和。丘、王二人由相交到相知，互诉对国事民生的关注，戊戌政变后，两人在四个月内共写了唱和诗歌近两百首，以表达心中的失望和哀伤。⁹ 在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光绪幽禁溥仪，而康梁则亡命外国，1898年后的一段日子，可以说是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的黑暗时期，有些忧谗畏讥，躲避乡曲；有些还有性命之虞，避地他方；例如黄乃裳即趁机率领乡人远走砂朥越，成就开辟“新福州”（诗巫）之功。¹⁰ 而康有为亦在1899年至1900年间访问美洲及南洋，引起很大回响；到南洋时获得新加坡诗人富商丘菽园的殷勤招待。这些消息不但在潮汕乡间为人共知，而且也在维新分士人中间广泛流传。丘氏认同维新变法，并对于海外支持变法之友人极表佩服和赞赏，有诗为证，愿曰“澳门有籍”：

海上我来寻大快，如君何止古宋家；
北湖南越英雄在，落日薰风柳絮斜。¹¹

这种情感与愿望皆成为丘王二人到南洋访问的间接动因，但较为直接的原因则有二：一是为了开办岭东同文学堂而需要向南洋富商筹募款项，¹² 另一方面则是帮助地政府向华侨社会宣示保商的好意。¹³ 其实，这两个原因皆不见于官方文献，只在丘氏诗作及南洋报章中反映出来。¹⁴

⁶ 新加坡《天南新报》，第699期（1900年10月1日）。

⁷ 潘飞声，字兰史，号剑公，又号独立山人，广东番禺人，孝廉，能诗善画，曾任香港《华报》及《实报》编辑，为“南社”要员，民国初年曾远赴德国，担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参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页169注53。

⁸ 王晓沧简历，见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页166注12。

⁹ 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页11。

¹⁰ 黄乃裳开发诗巫的历史，参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又见梁元生《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康西”黄乃裳及其“出境及记”》，收入氏著《十字莲花：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论集》（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页40-50。

¹¹ 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页9。

¹² 丘逢甲传云丘氏1900年在南洋为筹建新式学堂筹款。

¹³ 据丘氏自言，是受两广政府沈嘉霖道台的委托，到南洋劝谕保商者，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页18。

¹⁴ 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页18。

二、南洋地区的儒学复兴运动

与其说丘、王二氏在南洋地区开儒学之风气，启动孔教兴学的契机，不如说他俩只是适逢其会，担当着“及时雨”的角色。南洋儒学复兴运动之兴起，比丘王二人由中国南来起码要早三数十年，即大约在戊戌之间，而且主要是受到康梁的影响。兴孔学和建孔庙的意见，可能丘菽园在1897年已经首先提出来，但当时并未引起广泛注意和讨论。¹⁵ 在这以前的南洋华侨，主要由商人及劳工两种阶级构成，没有很多舞文弄墨及以教书为业的传统读书人。当然，这不是说南洋华社就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反之，此种影响到处可见，或从文物陈铭，或从生活习惯，处处皆见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但是作为有意识的社会建设和文化运动去推行，则是戊戌到庚子年间的事。

十九世纪末叶的南洋华人社会之所以对传统中华文化的兴趣大增，而且对国事更加关心，主要是由于客观环境的改变和区域内几位领导人的大力提倡与推动。环境的改变是因为华人移民人口增加及小区渐趋成熟，包括了较佳的经济条件和自办教育的能力，而且自从清廷在区内设领之后，中国与南洋之关系日益紧密，来往两地之华人日多，为南洋华教立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至于推动中华文化的重要领导人，包括最早中国派驻新加坡的领事左秉隆及继任的黄遵宪，都在任内大力推行中华文教，鼓励儒家思想和华文学校的发展。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产生的儒学和儒教复兴运动，则不单止是作为诗文、振兴学校的文化传承而已，更是有意识地提倡儒学，有系统和有计划地去传布教义及建立孔教，这个运动除了规模庞大及具积极性之外，还表现在下列几方面：第一，是有意地把儒学“现代化”和“白话化”；即把原来的古文儒家经典和课程重新用白话文改写和编撰，以适用于南洋华社，而且在编写课本和教材时，尽量使用本地熟悉的题材及比喻，在这方面，新加坡丘菽园的《新出千字文》和吉隆坡张克诚的《孔教撮要白话》可为代表；¹⁶ 第二，是有长期计划和有系统地推动儒学和深化儒学，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包括成立儒学的教研机构，为儒学作新的诠释及进一步的讲解，以及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到南洋访问和讲学；第三，是使用中英双语来推行，这方面更是南洋儒学所首创，不单止为了把自小接受英文教育的华人，也为了把儒家思想介绍给当地的其它族裔，是把儒学带出双语区的一次重要的尝试，这方面的的工作，则以新加坡的林文庆医生推动最为有力，贡献也最多。¹⁷ 最后，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初期在南洋推行的儒学运动，其

¹⁵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页83。

¹⁶ 这两份资料已收入梁元生编《宣尼浮海到南洲》一书之中，页164-190。

¹⁷ 林文庆(Lim Boon Keng)除了发表言论之外，也亲自用英文写了多篇文章，讨论儒家思想的好处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性，参李元璋《论林与儒家思想之关系》，《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页98-149，页吗？

核心精神更是一个以儒教为中心的宗教运动，包括建立孔子庙，设立教义和崇拜礼节等，目的是与现代西方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相抗衡。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对南洋儒学的两位主要人物——丘菽园和林文庆——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¹⁸ 故此在本篇文章中对丘、林二氏的贡献则从略，而集中讨论及分析丘逢甲及王晓沧两人的角色。

三、丘、王在南洋宣扬儒学的角色与贡献

正如上文所述，丘逢甲和王晓沧并非生长于南洋地区的本土人氏，甚至也是南来的中国移民，他们只是匆匆过客，在儒学运动刚刚于南洋一带勃兴之际访问新加坡及马来亚，却不料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力邀讲学解经，成为此次儒学复兴运动的两名重要人物，这并非丘、王二氏南游之初衷，但却使二人东南亚之行得到很大的欣慰及成就感。

丘、王二人于庚子（1900）年二月从潮州出发，先到汕头，有好友多人送行，包括从台湾内渡的诗人许南英（鬯伯）等。¹⁹ 二人自汕头乘船出海，经香港、澳门，过七洲洋（今南海），3月15日抵达越南西贡，停留不久，即下高棉，3月下旬到达新加坡。在香港逗留期间，曾晤同情孙中山革命之日本友人平山周及近藤五郎等，并赋诗以纪其事：²⁰

谁挟强亚旆，同洲大有入；
愿呼兄弟国，同向虎狼秦；
慷慨高山阻，纵横大湖尘，
支那少年在，早晚要维新。

随后，丘、王道经越南西贡，感慨其亡国之恨，写成“西贡杂诗”几首，其中一首：

未肯洋装换越装，金环佳鬻紫衣裳；
传经但读法卢字，遗教无人说土王。²¹

正是因为看到西方入侵后越南民族的苦痛，丘氏在三月底到了新马华社后，就刻意地讲到中华民族文化及语言传统的重要，鼓励兴办文教，提倡儒学。在

¹⁸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十九世纪末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亚洲文化》第11期（1988年6月），页3-13。

¹⁹ 许南英（1855-1917），台南人，1890年进士，与丘逢甲系识，同编台湾省志，甲午战后回南游防局筑坝，1897年内渡。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页2-3。

²⁰ 《清报》1900年3月31日，此处引自徐博东、黄志祥《丘逢甲传》，页137。

²¹ 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页21。

新加坡丘、王得到本地闻人丘菽园的招待，畅谈甚欢。丘菽园，名炜夏，名炜夏，祖籍福建海澄，生于新加坡富商之家，但自小好学，中国传统诗词书画，样样皆精，回乡应考，中式举人；最爱结交中国名士，常常出资义助维新人士，有“小孟尝”之称。斯时丘菽园在新加坡主编《天南新报》，一方面鼓吹康梁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则推动中国旧学，宏扬传统文化。丘菽园在1897年已提出建孔庙立孔教之说，可能是最早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其后无涯生在1899年又在《天南新报》中呼吁在南洋各地设立孔子会，才引起各地华社的热烈反应。²² 在丘逢甲和王晓沧抵达新加坡之前，《天南新报》上已多次刊载关于立教祭孔的文章，最为具体的要算魏介眉（魏明新旧主）的《拟各处华人联立孔教会章程并序》清楚提出由筹捐到会务章程二十则，是为兴学建庙运动的先声。²³

王晓沧在到达新加坡后，实时就这件事表明自己的意见，他写了一篇题为《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的文章，文中王晓沧向关心商务的闽粤华侨发出呼吁，以为教能助学，学能助商，并强调儒家思想一方面与货殖观念并行不悖，另一方面又发扬孔教知新之旨，与新世界并不脱节。最后，他鼓励华侨在新加坡建孔庙及开办大学堂，勿失人后，王文全录如下：²⁴

今日泰西诸国何以独强？有学焉以强之耳！人知其合羣力以强，而不知其士商先合羣力兴学以强也！视其远适异地，航海而导新地，每所至必先建教堂以尊教、建学堂而兴学，而商亦蒸蒸日上焉。此其所以强也！以其士商人知自强之义也！夫泰西之与我，教虽有异，其新学立自强之基，则理未尝不合，事未尝不同。今星洲我闽粤乡人贸易来者，约计不下百数十万人，亦岂不能合羣力以自强者？合羣力以自强者，则莫若尊国教、兴新学；尊国教，则建孔庙、设大学堂，其事尤不可缓。盖以雄团体、以开民智、以正人心，为自强之计者，将于是乎！在夫孔教集羣之大成，中国王陵将相及士庶人，无不奉孔教为归。其所以今日固渊于衰弱者，以不能实行其教旨！微言具在，即泰西绝学亦无能出其范围。他不具论，泰西重商学，而《大学》生财有大道一节，商学已包括其中；太史公之传货殖也，必首举圣门高弟，此能知士商合一之义也。且恐信等敬，孔子为当行发者也。今日统全球之人，证此心无其有能舍此两言而行者乎？！甚矣！孔教之大也。惟其教之大，任举端无不具大同。有如是者！且设大学堂，中西学兼习，实与孔教知新之旨不背。吾尝谓：善学孔子者，莫如谢孙氏。谢孙氏之言曰：

²² 无涯生（幼各地立祀孔子会），《天南新报》第271、273、275期（1899年4月29日，5月2日及5月4日）。

²³ 魏明新旧主（拟各处华人联立孔教会章程并序），《天南新报》第431-440期（1899年11月7-14日）。

²⁴ 王忠翔（晓沧）《星洲宜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天南新报》第534期（1900年3月26日）。

日知其所以亡。夫所亡者，非昔孔子所已言者，可知而无不可。以孔子知新之学口而学之者，又可知中西兼学，正所谓以闻孔教者也！今星洲以近州称，尝有不使其名而应其实者，建孔庙、设大学堂，集事既易，追就尤速。而一切达材有用之学，日新不已，以新其国，以新乎世界。吾将以此地为起点焉、引线焉。吧城、吉隆、望加錫、雪梨诸埠，其繁盛不逮星洲，而建孔庙、设大学堂，已屡见报章，况星洲为南洋总埠，闽粤乡人为南洋冠冕，而兹事独让美名，其可乎？孔子尝思浮海，人尝谓：吾道其南。乃其论在二千年以前，而应其事于二千年之后，亦自非偶然者！自我国变法不成，至今欲洋各商，泰西诸国亦不以平等相待，固亦其矣！《学记》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吾尤愿闽粤绅商，知所先务，合羣力以兴学，为自强基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恩翔阿崑山工部（即逢甲）为保商事，南来星洲，谒悉绅商会议及建孔庙、设大学堂，可谓正得我心。惜其事尚未举行，不禁慨然。为吾闽粤同志及善而好义、有力厥所谓贤豪者望焉！爰泐笔而为之说。

丘逢甲也不遑多让，随即发表了《幼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后》²⁵ 响应王说，其文曰：

光绪二十六年春正月，逢甲已于汕头创设岭南南文学堂，将合闽之漳、汀、粤之惠、潮、嘉人士而教育之。学堂宗旨以昌明孔教为体，兼练习东西文学为用。主其事者，则惠潮嘉海道盐沈崇熙观察也；总其教者，则翰林院检讨应温耀柳太史也，捐资为倡，则潮之绅商实有力焉。然不私为潮而公之，则以今日非合羣不足以自强。学堂其乃起点也！学堂事已定，于是乃以保商事与前潮州训导嘉应王晚沧广文，为南洋各埠之行。已至星洲，接见领事外，于闽之乡人先得见真君黼丞（黄乃裳）、林君文庆、徐君季铎，及菽园孝廉，则夙称同志，神交已久者也。于粤之乡人先得见林谷宣正郎，则来粤后之故人也；曾君兆南，则黄、徐二君之所称许者也。询星洲近事，乃知孔子庙及学堂事，惜久议而未成。三年前与菽园孝廉书，曾以此事发议，孝廉取登报章，郡人当皆得见。今闻此，心实惋惜之，不敢（进）一言，为吾闽粤乡人之知大义有大功者劝，夫南洋各埠绅商，号为善而好义，中外知之久矣，而星洲实为各埠之冠。累年各省灾荒，随捐之款，动以百数十万计，而多由星洲倡之，此其功在本国者也。至印度烟灾，非洲血战，亦各不惜财力以助英廷，因报及地主之惠矣。然此皆为人事也！若建学堂，则自为其子弟事也！今何切于为人而疏于自为？即闽粤各埠已各有庙，以祀其乡所崇拜之神，以希溟漠不可知之极；若孔之建，则尊教也，而即以保种保国，明大义者皆知之，此不言福，而福自及者也！内地信鬼之徒，凡建祠建

²⁵ 丘逢甲《幼星洲闽粤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后》，《天南新报》第535期（1900年3月27日）。

儒学（或孔教）的宗教性及与宗教制度的关联，以及文化、语言和民族的关系等，这些到二十一世纪还在不断讨论的课题，在百多年前已经出现过和讨论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可供现代人的参考。

参考书目

- 陈金树《丘逢甲在南游诗中所表现的心态》（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论文，2002年）。
- 丁旭辉《由“沧海”及相关意象看丘逢甲内渡后的心境与梦想》，《汉学研究》第21卷第1期（2003年6月），页367-390。
- 蕉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蕉岭县志》（兴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 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0）。
- 梁元生《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摩西”黄乃裳及其“出埃及记”》，氏著《十字架：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论集》（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页40-50。
-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十九世纪末新加坡的“儒学运动”》，《亚洲文化》，第11期（1988年6月），页3-13。
- 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 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
- 鹭门明新旧主《拟各处华人联立孔教会章程并序》，《天南新报》第431-440号（1899年11月7-14日）。
- 丘逢甲《劝星洲同乡人合建孔子庙及大学堂启》，《天南新报》第535号（1900年3月27日）。
- 王恩翔《晓论》（星洲宣建孔庙及开大学堂说），《天南新报》第534号（1900年3月26日）。
- 无涯生《劝各地立祀孔子会》，《天南新报》第271、273、275号（1899年4月29日，5月2日及5月4日）。
- 《天南新报》（新加坡），第699期（1900年10月1日）；第764期（1900年12月21日）。
- 徐博东、黄志萍《丘逢甲传》（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

粤剧网络——文化走廊 以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广府社群为例*

■ 伍荣仲
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历史系副教授

一、引言

粤剧名伶陈非非是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男花旦，在华南地区省港舞台驰骋足有十年时间，饮誉艺坛，排名仅在号称“花旦王”的千里驹之后。据陈氏个人回忆录的记载，他出身世家，在少年读书时代已醉心戏剧，在广州岭南中学毕业后工作了一段很短时间，就毅然瞒着家人，只身远赴新加坡，在当地拜师学艺，踏上舞台生涯。陈非非是约一九二零年前后抵达星洲，他师傅是著名的小武祝元亨。祝元亨本人颇长时间在星马一带走埠，正好为当地梨春园戏院名班永寿年台柱。这样子陈非非依经过数年苦心锻炼，又向其它前辈及路过星洲的艺人学习，并把师傅传授走埠的机会，争取舞台经验，崭露头角。一九二四年，陈非非依省港名班梨园乐罗致，从南洋回港，成为他演艺事业的转折点。当时正值粤剧在省港商业剧场进入黄金时代，数年间陈非非成为了首屈一指的男花旦，更成功地筹组资金兼任班主。可是好景不长，由于都市粤剧竞争激烈，担纲红伶薪金高涨，戏班在宣传、制作各方面皮费浩大，一九二九粤剧市场开始滑落，陈非非依首当其冲，虽艰苦经营，仍不免导致债台高筑，不得不在一九三四年急流引退，带着家人及几名徒弟心腹离开华南。首途上海在粤人聚居区城虹口登台数月，然后远渡南洋。在越南西贡、堤岸、海防、泰国曼谷先后巡回演出，继而移师马来亚各埠及新加坡，旧地重游；更在缅甸仰光登台，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才返港。¹

按陈氏大老信的身份，他班主的地位，他个人事业的野心，以至他在伶界中的影响力，固然与一般中下层的伶工有天渊之别。然而，以上有关他演艺生涯的片

* 此文取材于笔者正进行有关粤剧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计划。此研究得到美国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 及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慷慨资助。文章之完成, 有赖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戏曲资料中心张文珊小姐在百忙中协助中文打字, 一一致谢。

¹ 陈非非口述, 伍荣仲、陈泽蕃重编《粤剧六十年》(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粤剧研究计划, 2007), 页11-37。